

書 評

Reviews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By Xiaofei Ti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p. x + 319.

王國瓔，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

本書當屬田曉菲教授之力著。既含微觀陶淵明 (365-427) 作品文辭意趣之細，亦有宏觀文稿傳播文化之廣；書中不但涉及古代中國作家作品文集的編輯整理、文稿字句的訓詁校勘，亦流露現代西方接受美學理念中讀者積極參與創作之觀察，充分展現田教授融匯古今中外文學理論與評析之功力。按，書名之副標題：「塵几錄」，乃是全書論述旨趣的點睛之筆。據〈緒論〉中言，蓋源自宋綬 (991-1040) 所云：「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¹。

綜觀本書之筆墨重點，主要是以現存《陶淵明集》各版本中每每出現「異文」的陶詩為例證，說明傳統中國作者之文稿，於傳播過程中的流動性與不定性。蓋因作者的原始手稿，一但離開作者之手，經過他人的輾轉傳抄，其手抄本難免會出現無意的「筆誤」或有意的「修改」，繼而又經後人的編輯整理成集，即使北宋以後，陶集已刊刻成書，文句上還是會出現許多「一作」某某，或「又作」某某，或「當作」某某的「異文」，顯示編輯者或校勘者在不同版本之間文句取捨的躊躇立場與個人主張。以此點出，陶淵明其人格形象，如何在後世讀者

¹ 據本書〈緒論〉注三十一，引言乃取自〔宋〕沈括 (1031-1095) 著，胡道靜校注：〈雜誌〉，《夢溪筆談》（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卷25，頁261。按，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本《陶淵明集》，書末載曾絃（十二世紀前期）〈說〉：「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宣和六年 [1123] 七月中元臨漢曾絃書。」副標題中所稱 Dusty Table 當源於此。

的意念中、筆端下，形成典範，其文稿「異文」的增減取捨或加工潤色，又如何受到陶淵明高潔不群、任真自然的固定形象之引導。換言之，作者人格形象的形成與作品文句異文的產生，乃是經過歷代讀者與原始作者共同參與「創作」的結果。這種作者「人品與文稿」在讀者不斷積極參與的過程中，循環往復且互為佐證的現象，正是傳統中國文稿文化的特質。

全書在〈緒論〉章中詳細說明撰述主旨與寫作源起，最後並以〈結語〉總結題旨。其論述主體，在結構上分為六章，茲簡介如下：

第一章，從陶詩並後人相關筆記中舉例指出，北宋文人閱讀陶淵明詩文，包括流傳的手抄本或刻印成書的刊行本，在字句「異文」的取捨之間，如何深受當時文人士子思想觀念與士人文化的引導支配。乃至陶淵明其人格情性之「任真」，以及其作品乃自胸中「自然」流出之特色，當即定型於北宋時期文人士子的詮釋。

第二章，論述陶淵明在北宋以來文人士子階層中任真自然人格形象的形成淵源背景。主要是從四篇史傳〈陶淵明傳〉內涵情節的比對，探索陶淵明「是何許人也」。於此點出，四篇傳記中陶淵明的人格形象，顯然均以陶集中收錄的時人皆以為「實錄」的〈五柳先生傳〉為範本，乃是選擇性的人格塑造，且深受六朝文士階層推崇隱逸觀念與行為的引導。

第三章，試圖從陶詩中找出不同於史傳所述「陶淵明人格情性」的可能真相。特舉其描寫田居期間農耕生活之作為例，同時考慮一些通常在陶集「注」中提供的「異文」出入，以此揭示一個彷彿始終站在農村社區邊緣的陶淵明，一個經常自覺與現世社會有疏離感的陶淵明。換言之，一個人格情性頗為複雜多面的陶淵明。

第四、五章，繼而針對陶詩中不時出現的某些衷情之關懷，諸如：飲食、生死、功業、聲名等，說明陶淵明如何在歸田閒居生活中，自我省察日常生活狀況與歷覽古人書之際，雖可獲得與古賢德行節操的認同與安慰，卻仍然難以撫慰其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孤寂。以此或可與史傳或北宋以來諸文士對陶淵明固定人格形象的修補。

第六章，筆端轉向陶淵明身後。以其栗里故居一塊「醉石」的傳聞故事為焦點，歷舉唐宋明清以來幽人勝士如何相繼造訪，或敘述為文或吟詠為詩，以茲緬懷。即使此「醉石」所在地點在傳聞中已不只一處，而且石上陶淵明曾醉臥的凹凸痕跡，在歲月流轉中業已改變，甚至模糊損毀，卻仍然因為打上了陶淵明的印

記，視其為陶淵明的「化身」，乃至獲得了聲名。「醉石」的傳聞故事，猶如陶淵明或任何作者的原始文稿，雖與時推移，屢經變動、訛誤，而出現種種「異文」，卻會在作者身後而得以長存，甚至增添後世讀者對作者其人其文繼續研究探討的興致。

整體視之，本書為當今漢學界對古代作家作品之研究，提供不少頗具啓示，令人深思的精彩論述。最引筆者矚目者，姑舉數例：

首先，雖然自宋代以來，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研究，未嘗消歇，且當今學界已經開始從「讀者接受」角度來研讀陶淵明作品於後世的接受與影響，但是對現存陶集文本字句「異文」的取捨潤色，大多圍繞在文句字義的校勘考證，尚未像本書已經注意到，讀者對作者文稿並非全然無條件的「接受」，而是對文稿本身積極參與創作的問題。

其次，文本「異文」的選擇取捨，通常是編輯者或校勘者針對作者文稿修辭技巧或審美趣味之「優劣」，包括文句中引語、用典之「正誤」，遂提出異文取捨修改的建議。但是，陶詩中「異文」的選擇，還攸關到讀者對陶淵明人格情性的認定與塑造。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蘇東坡 (1036-1101) 對「悠然見南山」與「悠然望南山」的選擇。即使白居易 (772-846) 〈效淵明詩〉中有：「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後世讀者大多仍然同意蘇東坡的見解，認為「悠然見南山」的「見」字，更符合陶淵明「意不在詩」的寫作態度，以及但寫其胸中之意的灑脫無羈的人格情性。惟本書作者提出的疑問是：陶詩的原始手稿到底為何？令人深思，當今讀者實無法排除，其原稿可能是「悠然望南山」！

再者，將陶詩〈讀山海經十三首〉依其順序，解讀為一組微型「史詩」，展示詩人於閱讀經驗過程中遊仙之旅的精神漫遊。亦即從詩人農耕消閒中愉悅的「時還讀我書」，到遍覽書中光輝燦爛的神話英雄事蹟，到反顧充滿出賣、殺戮、飢餓的黑暗人間社會。即使此十三首的編排次序乃是經後人所為，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詩人陶淵明追求生命意義從寄望到破滅過程的體味。

像這樣一部涉及古人作品的研讀與文稿流傳文化的巨著，還是難免會引發讀者對論述中一些瑣屑的問題有所感想或補充。例如：

論及〈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終懷在歸舟 / 壑舟，諒哉宜霜柏」與〈雜詩十二首〉其五：「壑舟 / 歸舟無須與，引我不得住」，作者比較「壑舟」、「歸舟」異文對詩意的影響，引述有關「壑舟」的典故來源《莊子·大宗師》所云：「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惟詮釋之際（頁44），稱此「有力者」為「thief」（宵小？），予人以筆端含貶意的印象。倘能依譯文「the man of strength」（頁43），或許會減低貶意，且保持《莊子》引文中語意的「中立」。

討論〈連雨獨飲〉（頁135），特別指出「本詩最特別之處，就是詩中竟無一字涉及雨。」按，就筆者的觀察，中國古典詩歌的「標題」，無論作者自定或編者所擬，往往以湧起詩意的「背景」為題，點出其創作的環境背景為主。陶淵明〈連雨獨飲〉不過是點出其逢「連雨」且「獨飲」之際引起感懷的背景。就如陳子昂〈登幽州臺歌〉、王維〈使至塞上〉、杜甫〈旅夜書懷〉等，亦是點出環境背景的標目。

當然，任何著作的出版，對曾經辛苦筆耕的作者而言，最引為憾恨的就是排版或校對之際的疏忽或錯誤，本書自然亦難免。但是，小瑕疵畢竟不會掩蓋品質的優異。總之，田教授此著，當屬中西漢學界，尤其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者，不容忽略的一部好書。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By Jing Yuen Ts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xii + 329.

楊小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族主義可以說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從未間斷的中國主流思潮。而對於中國國族主義話語的探討，正如中國國族主義論述本身，長久以來也一直是一個熱門和響亮的話題。石靜遠的英文論著《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意圖並不是在於探索中國國族主義思潮的源流和脈絡，也不是在於總結中國國族主義研究領域的成敗得失，而是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觀察中國國族主義的精神動力和修辭策略。

這個「不是……而是……」（not... but... / rather than... / instead of...）的句式似乎也是貫穿了《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全書的基本句式。當然，根據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的說法，修辭本身就是站在辯證法的內容（而非僅僅是形式）這一邊的。可以看出，石靜遠的論述首先是對國族主義話語的重新闡釋，所以她在行文中必須一次次地打破固有或隱在的思維定勢。因此，本書的方法與其說是解構主義的，不如說是辯證法的，因為她不時從反面來觀察

到那些通常只從正面看到的東西。

不過，《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一書所依據的，與其說是阿多諾式的 (Adornian)，不如說是法農式的 (Fanonian) 辯證法。在本書的結語部分，石靜遠把她的方法溯源到法農 (Frantz Fanon, 1925-1961) 在《地球上受苦的人》²中所闡述的道理：擁懷自己的低迷，為的是喚起一種相異的、未被指定的理想性。因此，石靜遠將挫敗感視為中國現代性建構的關鍵，因為所有的現代化理想性，或烏托邦，都是首先通過對國族自身的負面理解才被激發的，而中國的國族身分也正是藉此形成而發展的。換言之，中國國族主義主要是基於某種危機意識，或者通過強化、誇張甚至操弄這種危機意識而發展起來的。理解了這一點，便理解了《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一書的主旨。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本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國族主義形成的早期階段，也就是從一八九五到一九三七年之間的文獻，但研究的出發點卻無疑與當代的背景密切相關。書中所提到的中美撞機事件、電視劇《河殤》、小說《黃禍》³、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⁴等，都是當代中國國族主義的重要契機。而中國國族主義的起源論述，用某種拉岡式的 (Lacanian) 起源學視角來看，也可以說是由對當代國族主義的回應而創造出來的。儘管本書並未提及拉岡 (Jacques Lacan, 1901-1981)，但精神分析的視角提供了作者對文化心理如何構建社會現實的探究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比如作者在作為引言的第一章裏使用一種近似拉岡的口吻斷言：「正是國族主義才使得國族成為可能」（頁26）。

當然，《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並不是觀念的隨想，也不僅是理論的鋪陳。作為一部探討現代國族主義文化的研究著作，本書所涉及的材料跨越了不同的文獻領域，從康有為 (1858-1927) 和梁啟超 (1873-1929) 的社會哲學，到林紓 (1852-1928) 的翻譯著述，到潘光旦 (1899-1967) 和張競生 (1888-1970) 的優生學和性學理論，到郭沫若 (1892-1978) 和郁達夫 (1896-1945) 的小說寫作，可以說包羅萬象。不過，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本書始終圍繞對中國現代思想中的自我否定傾向展開論述。而不同的文化表達，則是這種傾向在不同領域中的顯現：它們以各自的形態，但類似的思維樣式，參與到構建中國現代性的過程中來。

石靜遠對早期中國現代性的考察旨在說明現代的國族主體是如何由恥辱感所

² Frantz Fano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61).

³ 保密：《黃禍》（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1年）。

⁴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臺北：林白出版社，1985年）。

建立起來的，而進一步說，對「不知恥」的撻伐，構成了喚醒民衆國族意識的強大動力。以此爲出發點，本書探討了清末思想家對種族落後性的初步論說，包括康有爲、唐才常 (1867-1900) 和梁啓超以膚色爲標準的種族等級論如何設想通過與白種人通婚來實現種族進化，以及淺色人種在未來世界的主導權，著重發掘他們在論述中如何游移在種族衰亡的危言與種族復興的信心之間。因此，國族衰落可以被理解爲就是國族強盛的契機。而在林紓那裏，基於種族論的國族主義則是著眼於黃種人如何努力規避黑色人種受奴役的命運。

《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還討論了「黃禍」觀的源流和脈絡。一個最初由歐洲人使用，作爲對蒙古蠻族入侵恐懼的修辭，後來由西方作家構建爲對亞洲崛起擴張的想像，反過來滿足了中國人的國族建構欲望。石靜遠分析了敘述黃種人與白種人大戰，最後以黃種人勝利而告終的晚清小說《電世界》中對中國強盛的想像，或者說，對黃禍的復仇式正義性的敘事鋪展。因此，這種做法實際上只需要挪用原先的黃種人類原型，換上中華國族主義的角度，就能將災難轉換爲想像強大中國的未來烏托邦。而另一部晚清小說《新紀元》則通過將鴉片戰爭以來清廷與外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的國別加以對換，便以阿 Q 式的精神勝利法歌頌了未來中國的凱旋，滿足了復仇的幻想。《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試圖說明，晚清作家對中華國族強盛的想像恰恰建立在曾經被西方認作是獸性的修辭基礎上。

本書對種族話語的探討並未侷限在文學與哲學的範圍內。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科學話語的研究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觀察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試圖構建一個理想的現代民族性。由於異族通婚的文人式想像不易實現，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對科學的崇拜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等對如何從科學的角度，或者說，通過科學地改良人種來振興中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比如潘光旦所提出的方案與前人不同，對他來說，疾病不是隱喻，而是現實；精神的病症必須首先由身體的治療和種族的衛生來解決。不過，石靜遠也指出，不但對於周建人 (1888-1984) 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身體改造的工程並非以捨棄精神運動爲代價，即使是潘光旦這樣的中國優生學者，實際上也不得不回到對國民性改造的關注，因爲根據潘光旦的說法，對疾病的無知才是最大的疾病。這樣，潘光旦的理論便與國民政府一九三〇年代推行的「新生活運動」的官方話語發生了關聯，而「新生活運動」正是意在振興衰落的中華民族精神狀態。而當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潘光旦又將他的理論改造成一種振奮民族士氣的理論，並爲原先負面的民族性概念注入了相當程度的正面肯定。無論如何，這樣的改變似乎並不僅僅是時代強力的作用，也是理論邏輯自身

發展的結果。《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對優生學論述中內在的錯綜意味的發掘並未止於此。作為對照，張競生的優生學強調了美對於改造醜惡民族性的重要。不過本書試圖說明的是，儘管角度不同，張競生對於種族優化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應和了潘光旦，並且在細節上同樣契合了「新生活運動」的基本理念。而張競生對「新女性」概念的闡述，更是包含了改造傳統國民性的內容。不過，有意思的是，對張競生來說，如果「美制」（美的體制）是人種改良的關鍵，在這個過程中，監察和操控卻是重要的一環。本書並沒有深究，但讀者似乎更有興趣的是：淨化的理念不禁令人想起納粹主義，對除雜的籲求與壓制之間究竟有多遠？而這個問題也從中國現代種族論的開始就可能暗含了複雜的答案。而知識分子的優生論話語與官方話語的關係，也應當是一個相當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當然，將魯迅 (1881-1936) 也置於致力發現負面民族性的論述系列中，並不出人意表。但也正因為此，本書對《阿Q正傳》的評說並未提供太多的新意。不過，在文學考察的方面，本書的最後兩章似乎是全書的高潮，將焦點放在現代敘事所表達的內在苦痛上，意在探討這種個人的苦痛如何蘊涵了對國族的悲憤與憂思。由五四時期作家對精神分析的興趣出發，石靜遠評析了魯迅、郭沫若和郁達夫有關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理論的言說，尤其是對「受虐」的理解。對郁達夫小說〈茫茫夜〉的詳細解讀則是從具體文本內尋求自殘過程的主體建構性，以及它如何通過對敗落和羞辱的描寫來探索民族尊嚴問題。作者敏銳地指出，在這樣的情形下，受虐的變態心理與行為並不是對偏離的肯定，而是通過對痛楚的自我掌控，重新喚回了主體的力量。同樣，郭沫若的〈喀爾美蘿姑娘〉和郁達夫的〈沉淪〉中的精神自卑和懺悔只能被認作是國族自強的反動力。同時，本書還討論了廚川白村 (1880-1923) 的「苦悶」概念是如何轉化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苦悶觀，或者說，魯迅如何將苦悶理解為一種受苦，一種批判現實的工具的。由此，作者認為，苦悶不是主觀型或感傷型作家所壟斷的，也是茅盾 (1896-1981) 和葉聖陶 (1894-1988) 這類自我定位為寫實主義的作家們所常用的方式，以內在的心理痛楚對應外在的社會政治壓迫：「苦悶不僅包含了性的折磨，也提供了革命的動力」（頁200）。作者還指出，錢杏邨 (1900-1977) 用集體政治話語來昇華或統攝個體性苦悶的規畫反而揭示了革命激情中的性的力量；不過可惜的是，這樣精彩的討論未能獲得更深入的探討。

通過揭示失敗話語在現代中國國族主義形成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以成功的辯證策略發現了中國現代性符號體系背後的那個拉岡意

義上的實在界。在這個具有拓展意義的開端下，值得我們繼續探討的當然是：究竟有多少創傷性的實在界幽靈出沒於宏偉的現代性話語的縫隙中？

《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葉洪生、林保淳著，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二〇〇五年。37+五五八頁。

Petrus LIU (劉奕德), Assistant Profess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Wuxia xiaoshuo 武俠小說 is a much mystified concept, for which we do not yet have an uncontroversial English translation. “Martial arts fiction,” “Chinese knight-errant fiction,” “Chinese gallant fiction,” and “tales of swords and chivalry” have all been proposed. The relation of this phenomenally popular but understudied genre to the history of Taiwan, itself another mystified concept, is the subject of Lin Pao-chun 林保淳 and Ye Hongsheng’s 葉洪生 ambitious *Taiwan wuxia xiaoshuo fazhanshi* 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 (History of Taiwan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this study, Lin and Ye set out to bridge a yawning ga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ulture in Chinese by offering a *historicist*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s,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Taiwan. The authors are enviably meticulous in their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the book is brimming with archival information they have reconstructed from newspapers on microfilm and personal copies of out-of-print books. An impatient critic expecting an argumentative-style literary analysis might be thrown off by the overwhelming presence of tables and appendices. Clearly, Lin and Ye places much emphasis on the cataloguing of authors, titles, dates, and other publication data, which give the book the look of an encyclopedia or desk reference book rather than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However, the insights of this learned book go well beyond fact-finding and historical philology. The colossal research undertaken here not only serves as a great aid to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genre, but also produces some stunningly radical re-interpretations of the genre that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s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 embedded in discursive and economic contexts.

This exciting new study is the product of five years of collaborative labor by two highly respected authorities on martial arts fiction. Lin Pao-chun is the founder of Tamkang University’s 淡江大學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including *Jiegou Jin Yong* 解構金庸 (Deconstructing Jin Yong)⁵ and *Aoshi guicai yi Gu Long* 傲世鬼才—古龍 (The Peerless Gu Long),⁶ an edited volume on Taiwan’s most illustrious martial arts novelist. Ye Hongsheng is a seasoned

⁵ Lin Baochun, *Jiegou Jin Yong* (Taipei: Yuanliu chuban shiye gongsi, 2000).

⁶ Lin Baochun, *Aoshi guicai yi Gu Long* (Taipei: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2006).

critic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whose books and essays on the genre since the 1970s have become a standard reading list for researchers on popular culture. He has also edited and annotated the authoritative Lianjing 聯經 series of martial arts fiction.⁷ The present collaborative project grew out of the two critics' shared concern about the dominance of "Jin Yong studies" (*Jin Yong yanjiu* 金庸研究) in the field and its attendant myths. Indeed, it has become all too common to conflate the name of Jin Yong (Zha Liangyong 查良鏞, 1924-) with martial arts fiction as such, and lay readers and professional critics alike often think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as a literary enterprise that originated in Hong Kong. This common perception not only discounts the intellectual debts postwar Taiwan and Hong Kong authors owe to Republican or Old School (*jiupai* 舊派) authors (including the now well-known Wang Dulu 王度廬, 1909-1977), but also misleadingly collapses and homogenizes the complex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criticism into a synecdoche, Jin Yong. In actuality, each decade of the postwar period was marked by a different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a different set of players, and Jin Yong's arrival was neither inaugural n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nre. As Lin and Ye demonstrate through carefully assembled historical evidence, many of the works of Taiwan authors predated those of Jin Yong and Liang Yusheng 梁羽生 (Chen Wentong 陳文統, 1926-), and Jin Yong's status as the godfather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was actually retroactively constructed by Jin Yong criticism in the 1980s, before which his reputation was to a great extent eclipsed by that of Gu Long (Xiong Yaohua 熊耀華, 1936-1985) and, to an even greater extent, by those of Old School writers. As Lin and Ye explain, the invention of the inventor, the myth that Jin Yong somehow "created" martial arts fiction out of thin air, was itself the result of a convergence of busines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that can only be explained with attention to cross-strait politics.

To capture a more nuanced sense of historical change, this study divid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Taiwan into four distinct eras, separated by landmark events: the embryonic stage (1951-1960), the golden age (1961-1970), the autumn (1971-1980), and the eventual decline of Taiwan martial arts fiction (1981-2000). The year 1951 saw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martial arts story in Taiwan, Lang Honghuan's 朗紅浣 (b. 1897) *Guse aixian* 古瑟哀絃. It was also the year when the KMT government instituted the notorious censorship system under martial law (*Jieyan shiqi chubanzhu guan zhi banfa* 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authorities eventually banned most martial arts stories in 1959 (a complete list of the blacklisted titles is found on pages 142-148). The roller coaster ride Lin and Ye take their readers on is the story of martial arts fiction's (re-)birth in Taiwan and its struggles against political censorship and social stigma.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Taiwan martial arts fiction—Wolongsheng 臥龍生 (Niu Heting 牛鶴亭, 1930-1997), Sima Ling 司馬翎 (Wu Siming 吳思明, 1933-1989),

⁷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ed., *Jindai Zhonggou wuxia xiaoshuo mingzhu daxi* 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 25 vols. (Taipei: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1984).

and Zhuge Qingyun 諸葛青雲 (Zhang Jianxin 張建新, 1929-1996), Lin and Ye's narrative also discovers many surprising connections between postwar Taiwan authors and the towering figures of Republican martial arts fiction such as Wang Dulu and Huanzhulouzhu 還珠樓主 (Li Shoumin 李壽民, 1902-1961) in their thematic concerns and narrative styles. Taiwan authors' replication of Wang's melancholic (*beiqing* 悲情) character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orceful idiom of the fantastic (*shenguai* 神怪) in Huanzhulouzhu both testify to this development. As these elements are significantly absent in Jin Yong, this reconstructed literary lineage again refutes the popular opinion that Taiwan martial arts fiction is derivative of Jin Yong.

The 1960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and an efflorescenc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in and Ye estimate that, during this second stage of Taiwan martial arts fiction's development, there were over three hundred different authors writing *wuxia* stories and ten publishing houses dedicated to the genre. Schematically, these stories fall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the technique-focused (*chaojiji xiaqing pai* 超技擊俠情派), the fantastic (*qihuan xianxia pai* 奇幻仙俠派), the innovative (*xinpai* 新派), and the demon theme-focused (*guipai* 鬼派). Each has a distinct progenitor in Old School martial arts fiction (the demon-theme, for example, i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Huanzhulouzhu's *Shushan jianxia zhuan* 蜀山劍俠傳).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however, martial arts fiction met new challenges and went into a period of steady decline. Lin and Ye attribute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to several fa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the advent of martial arts film and TV programs in the early 1970s. Instantly accessible and easily more exciting than the written originals, visual renditions of martial arts adventures took over the mass market and the creative energies of the authors after the first martial arts TV drama series was aired in 1971 in Taiwan. Within three years, the three TV channels (there were only three TV stations in Taiwan at the time) tried to meet the demand of an insatiable audience by creating thirty different martial arts TV series. Martial arts television was certainly riding on the success of martial arts movies, which had already begun to flourish in the 1960s through the works of legendary directors King Hu (Hu Jinquan 胡金銓, 1932-1997) and Chang Cheh 張徹 (Zhang Yiyang 張易揚, 1923-2002). Many of the movies were adaptations of Old School martial arts stories, but all the major works of Wolongsheng, Gu Long, Sima Ling and Zhuge Qingyun have graced the silver screen. The explosive success of Bruce Lee's *Fist of Fury* in 1972 brought about a sea change in martial arts cinema, turning it further towards action-based "kung fu" 功夫 and away from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wuxia* and *shenguai*. Interestingly, however, the power vacuum created by the decline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quantity actually helped solidify Gu Long's reputation as the master stylist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The immense popularity of film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for his career. The director Chor Yuen 楚原 (Zhang Baojian 張寶堅, 1934-) alone made fifteen movies based on his novels.

The period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is marked by a conspicuous absence of new authors and works in the genre. Gu Long died in 1985, and Jin Yong announced

he would never write another martial arts novel after his 1972 *Luding ji* 鹿鼎記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The only luminary that emerged in this period was the controversial Wen Rui-an 溫瑞安 (1954-), who is most noted for his experimentations with unconventional narrative forms rather than his fidelity to martial arts motifs. However, stagnancy is not stability, and this period re-defined the meanings of many works that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and enjoyed an underground circulation. The ban on Jin Yong's works in Taiwan was officially lifted in 1979, which explains why the 1980s wer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genre as far as Taiwan was concerned.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tself in 1987 was another watershed event in Taiwan, but one that proved to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fter 1987, martial arts novels from Taiwan began to be systematically—but more importantly, legally—reprinted in mainland China. The 1980s also saw the emergence of serious academic studies on martial arts fiction. Most writings on the genre remain plagued by a longstanding cultural bias, inherited from leftist writers in the 1930s, which is the idea that martial arts fiction is “popular fiction” instead of serious literature, and that martial arts fiction promotes violence and may even lead impressionable young minds astray. Nevertheless, criticism in the 1980s decisively shifted away from moralizing judgments towards concret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which the present book is an example.

The 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Taiwan through these four periods highlight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that set it apart from Hong Kong and early Republican traditions as well as from other types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One key difference Lin and Ye notice is Taiwan authors' “de-historicizing” tendency, in contrast to Jin Yong's “fictional historiography.” Unlike Jin Yong, whose works show a discernible Western influence despite their preoccupation with the theme of Chinese history, Taiwan martial arts fiction appears more impervious to non-Chinese narrative models. Martial arts fiction is also distinguished by its length; a typical martial arts novel is at least 40,000 words (p. 152). The stories Lin and Ye tell about the pervasiveness of plagiarism, ghost-writing, imitations, and other types of borrowings in the tradition will be shocking to critics who uphold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early years, it was a common practice for new writers to publish their stories under the name of a more marketable author (such as Gu Long) and “test the waters,” with the tacit consent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and the other author. These patterns of cultural practice hardened the hostility of critics who dismissed martial arts fiction as thoughtless “mass literature,” but, in my view, these patterns of borrowings in Taiwan martial arts fiction imply a type of intertextuality that will force us to revise our normative sens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reation. Lin and Ye's work is not just a timely intervention in the field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criticism, but in many ways an important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this study, like its object itself, is something we are on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y Frederick Coop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xii + 327.

江勇振 (CHIANG Yung-chen),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DePauw University

非洲史專家 Cooper 這本書，代表了一個歷史家對後／殖民理論的省思與批判。Cooper 開宗明義地讚揚後／殖民理論在近二十年來，無論在文學、人類學，或者史學研究的領域裏，都已經產生了振聳發聵的作用。他指出後／殖民理論一方面徹底地拆穿了歐洲人以自由、進步為己出，完全無視於西方近代史與殖民史之間的臍帶關係，而自鳴清高的假象；在另一方面，也拒絕了西方人把「非西方」社會貼上停滯與落後的標籤，渾然不問殖民的歷史如何影響了這些社會的命運的做法。然而，Cooper 也同時認為後／殖民理論在學術界之成為顯學，帶來了若干可慮的後遺症。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把各式各樣的殖民過程從歷史的脈絡裏抽離出來。其所造成的結果「不但是模糊了殖民史的細節點滴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具體經驗，同時，不同殖民地在不同歷史階段裏所產生的各種政治運動的願景與挑戰，也在殖民論述者對所有進步與民主之說嘲諷睥睨的眼光 (ironic gaze) 之下，而隨之銷聲滅跡」（頁4）。這本洋洋灑灑兩百多頁的論文集，就是 Cooper 在褒獎之餘，對後／殖民理論所作的尖銳批判。

本書分成三部分，共有八章。第一部分兩章，是作者開門見山對後／殖民理論的總批判。在第一章〈導論〉裏，Cooper 指出後／殖民理論所犯的抽離歷史脈絡的謬誤，可以用下述四種方式來說明：一、濫挑情節 (story plucking)，意即不管歷史背景，什麼時空脈絡下的資料都可以拿來對比、參照，就彷彿所謂的殖民性或者後殖民性，不管其社會、經濟、時代有何不同，都具有相同的特質一般。舉個例來說，即使一份文件說的是十六世紀西班牙治下的美洲，另一個黑奴的故事是發生在十八世紀的加勒比海，再另外一個文件所描述的是二十世紀非洲黃金海岸（即今天的迦納）還算富庶的可可農夫，都可以不分軒輊地被混在一起來做比較。二、跳略過歷史階段 (leapfrogging legacies)，意即討論甲階段所發生的事情如何影響了丙階段，卻完全略過了乙階段。三、以今釋古 (doing history backward)。我們爲了了解今天的社會，而回過頭去看歷史上一件很平常的事。問題是，我們不能把今天視爲理所當然的名詞、概念硬生生地套在古人的頭上。我們更不能因爲今天社會的現狀，就把過去所有的發展，都看成是造成現今一切之因；歷史有其斷裂性，歷史上多的是被人捨棄、遺忘的例子。四、時代謬誤

(epochal fallacy)。歷史的進程、時代的轉折總是拖泥帶水的，不可能像按電燈開關一樣，好像殖民時期一結束，一個乾淨俐落、如假包換的「非洲社會」就會呈現在我們眼前。第二章是 Cooper 綜覽二次戰後以來殖民研究的成果。他分析了五十年間，幾個流行理論在學界帶領風騷的軌跡，從五、六〇年代風行的現代化理論，到八、九〇年代所向披靡的後／殖民研究。他稱讚新學術潮流的貢獻，但更抨擊其抽離歷史、漠視殖民社會、經濟、制度等因素，從而忽略了被殖民者被統治、掙扎與抗爭的血淋淋實際。

本書第二部分的三章是 Cooper 以後／殖民研究三個主要的概念作為焦點，來批判其名詞、概念運用過濫，以致於失去分析效力的情形。這三個主要的概念是：認同 (identity)、全球化 (globalization)、以及現代性 (modernity)。Cooper 用圖表顯示這三個名詞在近十年來，成為學術界人人爭用的術語。其中，以「認同」最為熱門。在西元二〇〇〇年所出版的學術論文裏，有兩千篇以上的論文，其關鍵詞之一是「認同」。「全球化」居次，約七百篇（頁8）。他更以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的目錄做為例子，他說，「現代性」這個名詞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幾乎從來沒有在書名中出現過，但在一九九一年，它首次超過了「現代化」的使用次數（頁244，註7）。Cooper 認為這三個名詞已經被大家濫用到完全失去意義的地步。他並不反對學者使用一般人拿來作為描述不管是屬於事實或者是屬於願景的名詞或概念；他所批判的是，學者把這幾個描述或規範性的用語也同時拿來作為分析的名詞。首先，作為描述或規範性的用語，這些名詞的定義紛繁，幾乎可以說是到了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的地步。如果學者不加思索地跟著使用，或僅只是加上自己的界定，其結果只是徒增紛繁，完全無助於問題的分析與釐清。

其次，這些名詞概念濫用的結果，往往是失去了其歷史性與複雜性。比如說，什麼是「全球化」？其意義為何？全球化因地而不同，其表現也各異，絕對沒有其一致性。同時，如果全球化所指的，是國與國之間、洲與洲之間息息相關、統合宰制的關係，則這也不是二十世紀以後所特有的現象。新航路發現以後的歐洲殖民帝國，那跨歐、亞、非三洲的蒙古帝國，甚至於伊斯蘭教徒、行商所建立的洲際網絡，不也都在不同程度的範圍裏展現了類似的傾向？換句話說，全球化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並非是今日特有的現象，如果我們犯了「以今釋古」的謬誤，其結果只是失去了運用這個概念來加深我們對歷史的了解的機會。

同樣的，「現代性」指的是什麼？是一種狀態？還是一種表述 (representation)，意即，一種說明社會變遷如何造成與傳統有別的現代性的描述？從某個角度來

說，「現代性」和從前所流行的「現代化」又有什麼不同？更複雜的是，「現代性」究竟是單數還是複數的名詞？從批判西方帝國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學者的角度來看，非西方社會所應該或正在追求的「現代性」，與西方社會所產生出來的「現代性」是不相同的。然則，這樣的「現代性」又是什麼呢？如果「現代性」是複數的名詞，則這個名詞還有什麼解釋的效力？當批判西方的學者把「現代性」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歷史放在一起討論的時候，雖然他們的目的是在批判其兩者相生相謀、沆瀣一氣的事實，然而，諷刺的是，其結果反而是把西方的「現代性」供奉在一個作為標竿的牌位上。不但如此，把啓蒙時代以後的西方與殖民主義等同的做法，實際上是把西方社會文明簡單化了，它完全忽略了西方社會有其內在的矛盾與論辯。更重要的是，後／殖民研究所津津樂道的「現代性」，特別是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所描述的「現代統治術」(modern governmentality)：例如戶口調查、土地丈量，及其它政府掌控社會的政教社經措施，並不是所有殖民政府都做的；英國治下的印度可能如此，但在非洲則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Cooper 更進一步地反問，這傅柯所謂的「現代統治術」真的是在現代西方才產生的嗎？我們如何來解釋中國政府早在好幾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具備了好幾個「現代統治術」的特徵了？總而言之，Cooper 用了第二部分整整三章的篇幅，目的就在要求學術工作者不能人云亦云地套用流行的名詞觀念，而必須檢證這些名詞觀念的內涵和定義，同時還要不忘歷史的脈絡。

在用了全書將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嚴厲地批判了後／殖民研究的缺點以後，Cooper 在第三部分的最後兩章裏做了建設性的工作。他的目的在用嚴謹的歷史研究來說明後／殖民研究如何可以避免抽離歷史脈絡的謬誤。第六章利用二手著作研究的成果，做歷史的鳥瞰。第七章則以他自己對非洲塞內加爾 (Senegal) 的研究作為個案。第六章歷史的鳥瞰綜論的是從古到今的幾個帝國，包括羅馬和當前的美國。Cooper 指出，我們與其執拗地認為歷史的進程不外乎是從帝國轉成為近代的民族國家，不如留心地去考察歷史上不同政體的實際。從這個歷史的角度看去，我們將會發現民族國家與帝國其實是無法截然劃分的。帝國的體制或態勢絕非陳年舊事，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美國、冷戰期間的蘇聯，就是可資省思的兩個例子。同時，帝國體制可能已經不再，至少已經不再能為人所接受，然而，研究帝國體制——不管是西方的還是非西方的，不管是近代的還是古代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如何去統屬並分殊其所管轄的領土、資源、人種，並如何去面對帝國遼闊、鞭長莫及的難題。如果帝國體制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甚

至到六〇年代以後，才壽終正寢，其根本原因在於以民族國家為形、而以帝國態勢為實的國家——即英、法——體認到維持帝國的代價已非其所能承擔。這種歷史的觀察會有益於我們對世界史，或者說全球史的理解。也可以有助於我們超越把民族國家視為從帝國體制演化出來的這種不符歷史事實的史觀。帝國並沒有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能力，而必須權衡、妥協，甚至退讓。相對地，民族國家也可以霸氣十足，儼然帝國一般。Cooper 的重點在強調抽離歷史的脈絡，名詞觀念往往失去其分析解釋的效力。

在第七章裏，Cooper 對後 / 殖民研究正面大將了一軍，批判其在猛烈抨擊殖民史之餘，往往不自覺地把被殖民者的動能 (agency) 給抹殺了。他用他對一九四〇、五〇年代非洲塞內加爾工運的研究作為個案，來闡明帝國與殖民地之間錯綜複雜的鬥爭關係。他清楚地刻畫出塞內加爾的工運領袖如何善用帝國主義者自己的文明語言來還治其人。既然做為人，或者作為法國人，法國的工人得以享受基本工資以及其它的福利，作為「大法聯邦」(French Union) 的一員，塞內加爾的工人也應該能夠被一視同仁。Cooper 生動地描述了塞內加爾的工運領袖如何成功地以法帝國主義之矛，來攻法帝國主義之盾。其結果是，不但塞內加爾的工運成功，而且也讓法國體認到殖民帝國的維持代價太高，從而加快其殖民帝國解體的速率。這個案例除了告訴我們帝國主義的極限以外，也提醒我們必須領悟：並不是所有與殖民帝國抗爭的運動，都一定是跟民族主義有關的。

Cooper 所反對的不是理論，更不反對後 / 殖民研究的理論，因為他認為後 / 殖民研究在學術研究上有其極大的貢獻。然而，就像所有的顯學一樣，其流弊在於太多的人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到不知所云的地步。由於他本身就是一個善用理論的學者，他的救濟之道不是絕理棄論，而是愈發廣博、愈發沈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更徹底更批判性地去與其它學術領域交流，要更嚴謹更廣泛地去涉獵能夠幫助我們重塑、深化研究方法的社會研究理論」（頁6）。歸根究柢，Cooper 是一個關心政治、追求社會正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他而言，後 / 殖民研究最令他憂心的流弊在於其流於清談的傾向。歷史研究不應該只是紙上談兵，用Cooper 的話來說，「一個人如何研究歷史，就決定了其人的政治取向；一個人的政治取向，也形塑了其人的歷史研究」（頁231）。後 / 殖民研究的盲點就在其漠視歷史 (ahistorical) 的傾向，「一個漠視歷史的研究態度，其所反映而且鼓勵的，就是研究者不去關心政治 (apolitical)」（頁234）。Cooper 這本書是任何研究歷史、留心理論的人必讀之書。

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By Thomas A. Metzger.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xxviii + 816.

江宜樺，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自從中國大陸在一九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崛起以來，關心中美關係發展的人便不在少數。政治學者擔心中國強權的形成，是否會影響美國在全球各地的軍事布局與外交利益，從而引發兩強之間的激烈鬥爭。經濟學者密切注意中國市場的磁吸效應，懷疑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是否會因為十三億人口的產能與需求而出現無法逆料的轉折。生態學者則關切直線上升的人口成長與資源消耗，是否會繼美國之後，對全球環境造成災難性的衝擊。在這些實務性的關懷之外，也有少數人試圖從歷史傳統或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探索中美政經矛盾的文化根源，以及化解全面衝突的根本方案。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所著的《太平洋風雲：評當代中西政治理論之爭》，正是「中國研究」思想史途徑之佼佼者。

《太平洋風雲》一書卷帙浩繁，全文分成十四章，篇幅達八百多頁。這本書脫胎於作者一九九四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其中半數章節為先前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半數為專為此書出版而撰寫的文字。由於這本書所分析的人物頗多，包括唐君毅 (1909-1978)、胡國亨、毛澤東 (1893-1976)、鄧小平 (1904-1997)、李強、楊國樞、金耀基、John Dunn、F. A. Hayek (1899-1992)、John Rawls (1921-2002)、Richard Rorty (1931-2007) 等等性質殊異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因此本文無法逐一檢討作者對個別人物的理解與評述，而只宜由全書的核心論旨出發，說明作者的關切所在以及基本主張，並提供筆者一些看法。至於作者對個別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的臧否是否妥當，則留待方家評論。

墨子刻教授以「太平洋風雲」為題，可謂一語道出他內心的憂慮所在。太平洋兩岸的兩大強權（中國與美國）近年來大小磨擦不斷，隱隱然有「終將攤牌一戰」的發展趨勢。作為一個長期研究中國思想史、並對中國歷史文化懷有感情的美國學者，他當然不希望中美雙方爆發難以彌補的衝突或戰爭。因此他希望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點出中國與西方彼此看待對方的盲點，並力促雙方知識分子盡力擺脫本身文化思考架構的羈絆，以「批判反思」(critical reflexivity) 的方式檢討自己對「政治」、「道德」、「真理」等根本觀念的看法，試圖去理解對方所堅

持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判準，如此或能找出一條化解歧見、相互寬容的中間道路。

在作者的眼中，中西政治思想大致可分成六種類型的「論述」(discourse)，而其中又以第一種類型（當代中國政治思想）與第二種類型（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為大宗。其他的論述包括第三種（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第四種（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第五種（中世紀伊斯蘭與猶太教思想）、第六種（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等。墨子刻對西方政治思想的區分，基本上採用 Leo Strauss (1899-1973) 的架構（古典 / 中世紀 / 近代 / 當代自由民主），再加上傳統中國 / 當代中國兩類，總共六種。對他來講，每種論述內部固然存在著歧異（譬如當代中國就有孫文主義、毛澤東主義、新儒家、中國自由主義等四種異質性的思潮），但是相較於一套大論述與另一套大論述之間的差別，這種內部歧異反而不是重點。

《太平洋風雲》關切的是第一種論述與第二種之間的衝突。第一種論述代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看法，其基本元素包括：

（一）當前的世界秩序並不正常，因為中國未獲得應有的地位。

（二）中國的內部問題源自人民的自私自利，此一問題必須透過改造文化的方式加以矯正。

（三）道德及知識菁英是不同於凡民大眾的，他們知道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解決各種重大的政治問題。

（四）道德及知識菁英可以善用國家的力量，從上而下地改造社會，統治人民。

（五）從上而下的控制呼應「積極自由」的概念，也意味著法律與科學之外，我們還需要在政治、經濟、知識等三方面設定更多的規範。學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內化德性，祛除自私與虛偽。整個社會應該變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相對於此，第二種論述是當代西方知識界普遍的想法，其要素包括：

（一）西方文明是全世界的楷模，美國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而當前的世界秩序大致反映了此一事實。

（二）自私與虛偽是人性常見的弱點，這種特質總是會影響人類的（政治）生活。

（三）解決政治問題的知識並不完備，我們也無法確定那些人擁有這種知識。

（四）所謂道德及知識菁英並不存在，國家也不是可以信賴的工具，因為政

府總是不斷擴張其權力。公民應該以由下而上的方式，自由地組成一個公民社會，以監督國家免於腐化。

（五）由下而上的控制呼應「消極自由」的概念，這也意味著法律與科學之外，我們不需要在生活各層面設定太多的規範。學校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自由及法治的觀念，積極自由屬於個人私領域的事情。整個社會應視同一部人造機構，其成員自由互動，沒有特定的終極目的。

在以上簡略的對比中，墨子刻特別重視雙方在知識論看法上的分歧，甚至認為這是兩種論述根本歧異之所在。對他來講，中國人普遍抱持「知識論上的樂觀主義」，認為改造社會的客觀知識是存在的，擁有這種理性知識的道德知識菁英最終能夠得到國家的重視，並可以透過教育制度產生社會所需要的種種規範，以節制人民不致因享有自由而趨於放縱。相反地，西方人普遍抱持「知識論上的悲觀主義」，認為沒有確鑿無誤的知識系統可用以改造社會，也沒有辦法證明誰是具有如此真知灼見的菁英。賦予人民最大程度的自由固然有造成社會失序的風險，但這仍然是促使社會進步的不二法門。此一知識論立場上的歧異，使當代中國人與西方人彼此懷疑對方政治思想的正確性。前者認為後者極不負責也極不理性，是一個缺乏文明教化的民族；後者則認為前者專斷而不可理喻，是一個毫無自由法治概念的國度。這種相互否定的觀感，才是中美衝突最深沉、最根本的原因。

那麼，我們該如何改變這種互不信任的情況，使世界和平有更多的希望呢？墨子刻認為我們必須從方法論上著手，反省政治理論究竟應該包含那些要素，並找出評估各種政治理論高下的判準，如此我們才能獲得一種「批判反思」的角度，清楚指出中西兩大論述的當與不當之處。具體而言，他認為政治理論必須包括：（一）關於政治生活「目的」的說明；（二）實現該一目的應採行的「方法」；（三）與此一目的有關的所有其他「既成世界」的因素之分析；（四）關於何謂政治「知識」或政治理性本質的探討。他接著提出十九項判斷政治理論是否妥當的標準（此略），督促中美雙方的知識分子都能檢討自己的思考能否通過檢驗。

墨子刻最後的結論是相當有意思的。他認為無論中美任何一方，都無法符合上述政治理論判準的檢驗，尤其在界定何謂理性、何謂道德的問題上，中美知識分子皆擺脫不了我族中心主義的思考框架。墨子刻自己的看法是：所有政治理論都必然根植於特定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處境，因此也必然是某個「我群」

(we-group) 團體的集體心理投射。在這個意義上，他顯然接近當代西方社群主義者的立場。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堅決拒斥相對主義及虛無主義的思考，認為它們是自我矛盾的信念。他認為人類的生活固然未盡通透明瞭，但探索人類生活真理的政治理論依然存在。只要我們尊重並掌握某些「毋庸置疑」的要素 (the indisputables)，我們就能夠逐步釐清一個客觀有效的理論之基礎。

中美雙方所需要的理論，在墨子刻看來，是一種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理論。他大膽呼籲西方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不要再以自由民主為唯一標準衡量中國，而指責中國為野蠻的專制國家。事實上，從歷史發展的比較視野來看，他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進步的專制國家」（就像七〇年代、八〇年代的國民黨政權一樣），值得鼓勵與肯定。另一方面，他也呼籲中國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不要繼續用帝國主義的標籤批評美國、不要繼續埋怨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因為他們必須學著瞭解當前美國對全世界的領導，基本上並不是一種不正常、不合理、不道德的現象。

在筆者的瞭解中，墨子刻乃是當前西方學界極少數同情中國歷史傳統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對「政治」、「理性」、「道德」等觀念所抱持的開放態度，以及力促西方知識分子檢討自身盲目預設的立場，尤其不是 Leo Strauss、Alasdair MacIntyre、John Dunn 等其他知名知識分子所能比擬。我們順著這個態度往下看，就可以看出他對「批判式反思」的堅持，以及「接受相對主義但堅持某些基本原則或要素」的立場，確實也比（他所謂）現有西方的四種論述來得合理且具有說服力。當然，我們是否要接受他的建議，停止對中國政府違反自由人權的指責，以及默認美國全球霸權的事實，視之為合理且正常的政治秩序，則由讀者自己判斷。

《太平洋風雲》值得商榷之處有三，謹提出如下以就教於方家。

首先，作者的學術訓練是思想史，因此在思考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時，也自然而然地強調了「以思想解決現實問題」的傾向。換句話說，他似乎認為中美兩國的衝突來自於雙方思想體系的差異，其化解之道也只能由重建雙方政治理論著手。這種思考方式，正是林毓生教授所說的思想決定模式：彷彿歷史變遷的力量不是來自別的根源，正在於思想觀念本身，只要思想觀念矯正了，現實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林先生批評這種想法不遺餘力，也經常提醒思想史學者不能一再重蹈覆轍。墨子刻書中提及此一問題，但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寫作策略也遵循同一法則。事實上，思想觀念固然重要，但不是決定文明衝突或文明和解的唯一

因素。舉例而言，泰國或印度與美國的論述類型幾乎就像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一樣大，但她們並沒有與美國產生劇烈的衝突。伊朗與伊拉克的思想論述幾乎可說是大同小異（至少與西方比較而言），然而兩國關係形同水火。現實世界的利害衝突、偶發性的歷史事件、政治領袖的判斷與決定，往往扮演著更關鍵性的角色。

第二，墨子刻十分費心地歸納出第一種論述與第二種論述，以之分別代表中國與西方，然而我們不能不說這種「理想型」的建構法，其精確性的確有極大問題，而且很難公平反映個別論述內部的高度歧異性。以第一種論述為例，墨子刻把毛澤東思想與新儒家列為同一類型之下的不同亞型。但是任何熟悉這兩種思想體系的人都知道，毛澤東與徐復觀的不同，或是鄧小平與錢穆的差異，恐怕已不是墨子刻所列出的幾點共識所能掩蓋，更何況他們根本就沒有分享那些共識。再以第二種論述為例，Leo Strauss 與 Richard Rorty 無法冶為一爐，Hayek 與 Rawls 也南轅北轍，墨子刻的第二種論述理想類型也許涵蓋了一些人，卻必須以犧牲更多人為代價。這種理論建構方式的妥當性，值得所有研究比較思想史的人留意。

第三，筆者不能不說，閱讀這本厚重的著作，有時真想半途而廢。墨子刻教授的學問功力，自然不容懷疑。可是這本書的選材標準，實在令人難以理解。譬如，我們不瞭解分析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為什麼不是挑選李慎之、劉軍寧或王焱，而是李強？分析臺灣自由主義者，為什麼不是胡佛、葉啟政或錢永祥，而是楊國樞？唐君毅與 Richard Porty 當然不是不能比較，但為什麼不是劉小楓與 MacIntyre？金耀基的社會學思考固然值得分析，但這個章節又該如何與其他章節銜接？墨子刻指前述質疑只是中國社會「文人相輕」的體現，彷彿讀者只在意自己重視的人物及思想是否出現在書中，但是這並沒有回答真正的問題，也無法提供太多的說服力。此外，這本著作經常出現洋洋灑灑的知名人物，卻分別只用一、兩句話淺淺帶過，根本看不出排列如此陣仗有何意義？書中第四十三頁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短短一段文字中，出現十四個偉大思想家的大名，平均每個人的解釋（或引述）不到三行，除了讓入門者震懾於作者涉獵之廣袤外，不知增益了什麼實質知識？如果作者能以論述更精準，但是篇幅更儉約的方式經營這本著作，相信可以大大提高思想史研究對讀者的吸引力。